

克拉克瓷器的再探討—— 以中國消費市場為中心

■ 劉朝暉

在開啟早期全球化的大航海時代，克拉克瓷器（Kraak ware）成為東西方貿易中的重要商品，在物質文化交流中引發了世界性的影響。長期以來，克拉克瓷器作為典型的外銷瓷，研究者對其的研究和討論都集中在風格特徵、沉船發現、海外出土與收藏、貿易線路、東西方陶瓷交流等議題上，而較少考慮這類器物是否具有國內消費的問題。

二十世紀八〇年代，中國的陶瓷研究者注意到江西墓葬中出土的萬曆時期（1573-1620）特殊類型的外銷瓷器——這些青花大盤的內壁盤沿均有八蓮瓣形開光，並進行了探討。其中一件江西南城縣明益宣王朱翊鉞（1537-1603）墓出土的瓷盤，此前就有公佈，但最初的報告中並不清楚這是外銷瓷，在西方被稱為「克拉克瓷器」。¹九〇年代，江西文物工作者陸續發表當地墓葬出土和徵集的這類資料，從而引發了研究界對國內墓葬出土克拉克瓷器的討論。²這些器物大多有瑕疵，因此被看成是作為外銷瓷的殘次品而被處理留存在國內，學界基本上還是認為克拉克瓷是專供外銷而生產。

在中國國內，除了景德鎮觀音閣、落馬橋、珠山御窯場³等窯址考古發現外，克拉克瓷器是否僅在墓葬出土？這類瓷器在中國是否有內銷市場？若有，它的消費對象是誰，其消費階層如何？這些瓷器在國內的使用功能又是什麼？本文試圖利用最新的考古發現和被忽略的器物資料，重新審視和探討克拉克瓷器的國內消費問題。⁴

江西墓葬出土的克拉克瓷器

正如前面所述，克拉克瓷器在江西南部的南城、廣昌、會昌等地墓葬中有出土。這一現象已引發學術界的關注和討論，目前最為全面的分析當屬李寶平博士的專門研究。另外，最近出版的研究圖錄《明代景德鎮民窯紀年青花瓷》，收錄有所有江西紀年墓葬中出土的克拉克瓷，提供了迄今為止最為全面的圖像資料和相關信息。⁵

江西出土克拉克瓷的墓葬，年代最早為萬曆元年（1573），最晚在南明弘光元年（1645）。這些墓主的身份，有藩王，有布政使這樣的地方大員，但大部分是平民。出土的克拉克瓷器，質量也有差異。益宣王朱翊鉞墓和明代布政使吳念虛夫婦合葬墓中出土的青花盤質量較高，其他墓葬中出土的瓷盤基本上都有窯裂、燒制變形等明顯缺陷。益宣王墓中出土的克拉克瓷盤（圖1），雖然總體精細，但口沿可見重新補釉的痕跡（圖2），所以研究者推斷江西墓葬出土的克拉克瓷器都是外銷的殘次品。從器形來看，出土的克拉克瓷器均為盤類。明清時期江西地區



圖1 青花花鳥開光盤 萬曆31年（1603）益宣王朱翊鉞墓出土 江西省博物館藏 取自江西省博物館編、彭明瀚著，《明代景德鎮民窯紀年青花瓷》（下），北京：文物出版社，2018，圖53。

墓葬中，可見瓷盤枕於死者頭部的葬俗，這種盤子被稱為壽盤。有學者推測這些殘次品是從景德鎮運往外銷港口的沿途，被揀選處理，廉價賣給當地人用作墓葬的壽盤。

值得注意的是，明代布政使吳念虛夫婦合葬墓中出土的兩件青花盤，其中一件保存較為完好（圖3），器物本身沒有任何變形，也不見窯裂，僅口沿殘缺一小塊。因該墓是被盜掘後才清理，所以這個缺口極有可能是在盜掘時受損的。若此推測無誤，那這件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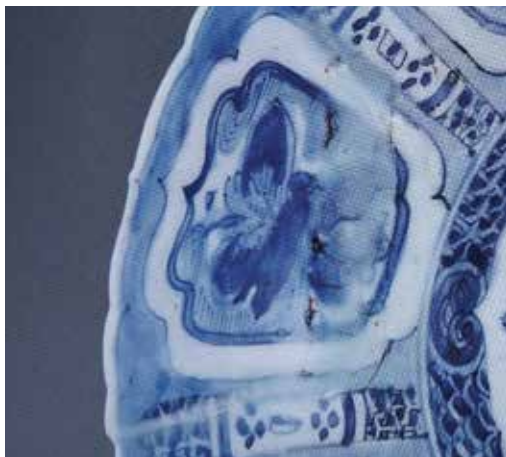


圖2 青花花鳥開光盤 萬曆31年（1603）益宣王朱翊鉞墓出土 江西省博物館藏 取自江西省博物館編、彭明瀚著，《明代景德鎮民窯紀年青花瓷》（下），圖53。

子在隨葬時應該是沒有任何瑕疵。同出的另一件青花盤，雖然殘破較多，但器物本身也沒有任何變形，不見窯裂。估計同樣是因盜掘導致受損，本身也應該沒有瑕疵。由此可見，江西墓葬中所使用的並非全是殘次品，而應該有正品。益宣王墓中隨葬的瓷盤，雖

然有重新補釉，但僅為小瑕疵，總體質量依然很高。之前學者推斷江西墓葬使用的克拉克瓷都是處理後的外銷殘次品，值得商榷。如果說有正品的克拉克瓷用於國內喪葬，那麼克拉克瓷專供外銷的觀點，也需要重新反思。



圖3 青花雜寶紋開光盤 天啟元年（1621）明代布政使吳念虛夫婦合葬墓中出土 江西省博物館藏 取自江西省博物館編、彭明瀚著，《明代景德鎮民窯紀年青花瓷》（下），頁361，圖61。

江西墓葬所出土的克拉克瓷盤，除了作為壽盤，還兼作墓誌。在瓷盤上刻字當作墓誌，也是明清時期江西地區墓葬中的常見現象。許多學者都關注到香港中文大學文物館收藏的〈青花花鳥紋盤〉（圖4），即是克拉克瓷盤做墓誌的特殊例子，也是目前所知的

唯一一例。其底部錐刺墓誌（圖5），可知這件瓷盤出自江西石城縣的墓葬中，石城縣也在江西南部，靠近廣昌。墓主人陳期聖于萬曆庚申年（1620）去世。同樣值得注意的是，這件器物品相完好，質量上乘，也再次證明正品的克拉克瓷在江西墓葬中是有使用的。



圖4 | 明 萬曆 青花花鳥紋盤 高5.7，口徑31.5，足徑17.3公分 文物館發展基金 藏品編號：1992.0146 © 香港中文大學文物館藏



圖5 | 明 萬曆 青花花鳥紋盤 底部 高5.7，口徑31.5，足徑17.3公分 文物館發展基金 藏品編號：1992.0146 © 香港中文大學文物館藏

內銷的新線索：國內遺址出土

除以往所知墓葬出土外，近年來克拉克瓷器先後發現在遼寧新賓縣赫圖阿拉城址、北京故宮南大庫瓷器埋藏坑、太原晉王府、明清廣東承宣佈政使司署等遺址有出土，遺址性質從官署、後金政權都城到藩王府、明清紫禁城皇宮，等級很高，表明這類瓷器作為日用品，供當時統治階層消費使用。這些遺址出土的克拉克瓷器絕大多數為盤，最新

的發現中出現碗，讓我們認識到國內使用的克拉克瓷器類型的多樣性。

一、遼寧新賓縣赫圖阿拉城址出土

1998年，遼寧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在遼寧新賓縣赫圖阿拉城城內兩處建築遺址進行考古發掘時，出土有明代瓷器。其中明代晚期瓷器中，至少有三件典型的克拉克瓷器殘片（圖6～8），均為盤類，分別繪雙鹿紋盤、花鳥紋等，⁶年代為萬曆時期。



圖6 青花開光盤殘片 遼寧新賓縣赫圖阿拉城址出土 取自王霞，〈關於赫圖阿拉城址出土明代瓷器的思考〉，圖7。



圖7 青花開光盤殘片 遼寧新賓縣赫圖阿拉城址出土 取自王霞，〈關於赫圖阿拉城址出土明代瓷器的思考〉，圖9。



圖8 青花鹿紋開光盤殘片 遼寧新賓縣赫圖阿拉城址出土 取自王霞，〈關於赫圖阿拉城址出土明代瓷器的思考〉，圖11。

遼寧新賓縣赫圖阿拉城，是努爾哈赤後金政權的第一個都城。赫圖阿拉城於1601年開始建造，1603年完成。1619年努爾哈赤建界藩城並以此為都，赫圖阿拉不再成為努爾哈赤政權中心。

赫圖阿拉城城內發掘的兩處建築遺址，結合文獻考證，分別為「尊號台」、「駙馬府」遺址。「尊號台」是努爾哈赤上尊號的衙門——汗宮大衙門，是城內外最重要的遺址。「駙馬府」遺址是城內除「尊號台」遺址外唯一的高臺建築，規格也非比尋常。這兩處遺址規格高，發掘者考證其建築年代在明代晚期，即後金建國之前或建國之初。⁷

赫圖阿拉城出土的瓷器，發掘報告分為明代早期、明代中期、明代晚期三大部分。明代晚期的瓷器包括嘉靖和萬曆兩個部分，既有帶「大明萬曆年制」款的官窯瓷器，也有克拉克瓷器和民窯青花。

二、北京故宮南大庫瓷器埋藏坑出土

2014年8月，北京故宮博物院在南大庫區域西段消防管道溝內發現了一處瓷器殘片堆積，清理出瓷器殘片總計有約數萬片，年代涵蓋明洪武時期至清光緒時期。在明代晚期的青花標本中，值得注意的是出土有一件克拉克大盤殘片。（圖9、10）「內壁繪大蓮瓣開光，內繪花草、蜜蜂圖樣，均為雙勾填色，青花暈染用色深、淺搭配。從開光佈局、花卉畫法、青花發色等特點來看，該盤符合萬曆時期克拉克瓷器的特點。同樣風格的瓷器殘片在同一區域其他發掘地點還有出土。」⁸

〈關於故宮南大庫的思考——歷史意涵、建置及克拉克瓷相關問題探討〉一文對南大庫發現克拉克瓷器的相關情況作了詳細討論，對出土信息有所補充，稱「在該區域還採集到兩件克拉克瓷殘片」，「一件口沿可見兩處大開光，似勾繪花果紋，之間夾繪小開光，內腹殘留部分松樹紋。另一件似為盤腹殘片，內外可見開光，其中內壁繪兩處圓點，中間夾三條長方柱」。⁹（圖11）該文推斷南大庫



圖9 青花開光盤殘片 北京故宮南大庫瓷器埋藏坑出土 北京故宮博物院藏 作者攝於北京故宮「明清御窯瓷器——故宮博物院與景德鎮陶瓷考古新成果展」展廳



圖10 青花開光盤殘片 背面 北京故宮南大庫瓷器埋藏坑出土 北京故宮博物院藏 取自故宮博物院考古研究所，〈故宮南大庫瓷片埋藏坑發掘簡報〉，《故宮博物院院刊》，2016年4期，頁22，圖54。



圖11 青花開光盤殘片 北京故宮南大庫區域採集 北京故宮博物院藏 作者攝於北京故宮「明清御窯瓷器——故宮博物院與景德鎮陶瓷考古新成果展」展廳

出土的這三件克拉克瓷的年代都為萬曆晚期。

學者已考證，南大庫區域曾經是清宮瓷器庫，這些克拉克瓷曾經儲藏於瓷器庫，並為宮中所用。對於為何萬曆晚期的克拉克瓷，會出現在清代宮廷之中呢？該文提出一個推斷：明代萬曆末期以後，御窯廠逐漸停燒，民窯擔負起宮廷用瓷的任務。景德鎮民窯，特別是利用珠山御窯廠窯爐進行燒造的窯場，輸送進宮的瓷器中包含了克拉克瓷器。這些清宮舊藏的克拉克瓷，很可能是先進入明代宮廷，明清易代後又被清宮接受。

另外，值得關注的是，北京故宮博物院收藏的清宮舊藏瓷器（故字號瓷器）中，也有數件克拉克瓷器。在北京故宮出版的圖錄中就收錄一件清宮舊藏的〈青花開光異獸花果紋大盤〉。（圖12、13）該盤「盤心錦地八方菱形開光內會柏樹、異獸。內壁畫八個蓮瓣形開光，開光內繪花果紋。外壁八組開光內繪靈芝紋。圈足內素胎無釉。」¹⁰另外，北京故宮研究人員還提到一件清宮舊藏的〈青花開光花果紋盤〉，「該盤葵形侈口，淺腹，矮圈足，盤心繪山石、松樹及一鹿一鳥，內壁繪開光八組，開光內繪花果紋，外壁開光內繪變形靈芝紋。關於該盤的年代，故宮檔案記載為萬曆時期。」¹¹這些清宮舊藏，都表明克拉克瓷器曾經在清宮中有使用，而且並非個例。

三、明清廣東承宣佈政使司署出土

明清廣東承宣佈政使司署，位於廣州南越王宮署遺址一帶。在南越王宮署遺址發掘中，發現有〈青花開光雙鹿紋盤〉等克拉克瓷器。（圖14）¹²這類雙鹿紋盤在「萬曆號」沉船中出水很多（圖15），年代應在萬曆末期。

四、太原晉王府出土

2012年8月，山西省太原市食品街改

造建設工地出土一批元明清瓷器殘片。該地位於明晉王府遺址外城西南約 150 餘米（圖 16），採集的瓷器中有一批帶有「晉府宮用」、「典膳所造」、「內膳所造」等款識，與明代晉王府相關。在這 9 件王府用瓷中，發現一件克拉克瓷器，為〈青花八開光鹿紋杯〉。（圖 17）這也是目前為止除盤以外，國內出土克拉克瓷的第二種器型。¹³

該花口杯外壁作八開光裝飾，開光內繪有鹿紋。這類開光鹿紋杯在沉船中如聖地亞

哥號（San Diego）就有出水。和外銷類型不同的是，這件器物「內底繪正面龍紋，發束兩側分開，細身，五爪。龍紋周身分佈雲紋，呈飄帶狀」。¹⁴外底青花雙圈，書寫「晉府宮用」楷書款，可以得知這是晉王府專門在景德鎮訂制的。器身曾做過修補，可見錫釘痕，明顯是使用過的日用器。這也是這批出土的晉王府瓷器的共同特徵，皆有錫釘孔痕，說明這些瓷器在王府中是反復使用，即便破損仍會修復利用。



圖 12 | 青花開光異獸花果紋大盤 清宮舊藏 北京故宮博物院藏 取自故宮博物院編，《故宮陶瓷館》下冊，頁350，圖273。



圖13 青花開光異獸花果紋大盤 底部 清宮舊藏 北京故宮博物院藏 取自故宮博物院編，《故宮陶瓷館》下冊，頁350，圖273。



圖14 青花開光雙鹿紋盤 明清廣東承宣佈政使司署出土 廣州南越王宮博物館藏 作者攝於展廳



圖15 青花開光雙鹿紋盤 「萬曆號」沉船出水 取自 Sjostrand, Sten. & Sharipah Lok Lok Syed Idrus. *The Wanli Shipwreck and its Ceramics Cargo*. Kuala: Department of Museums, Malaysia, 2007, 20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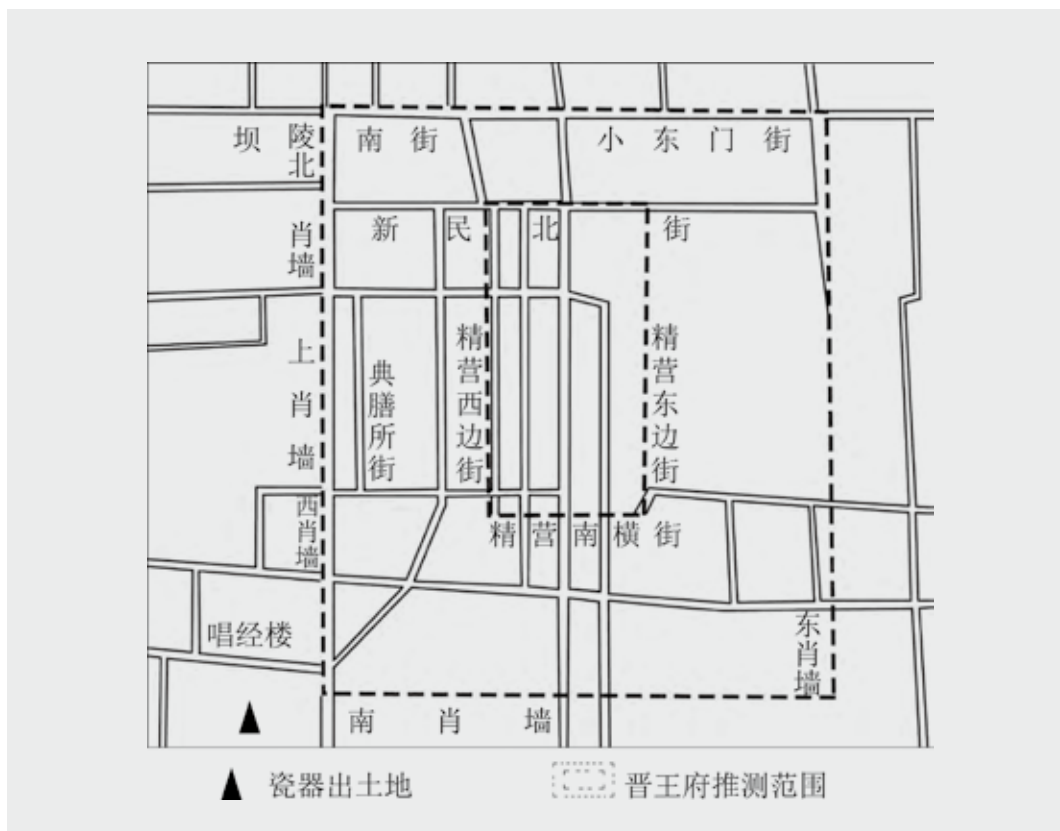


圖 16 | 瓷器出土地及與晉王府遺址位置關係圖 取自曹俊，〈太原食品街出土明代晉府瓷器及相關問題探討〉，圖1。



圖 17 | 青花八開光鹿紋杯 太原晉王府出土 取自曹俊，〈太原食品街出土明代晉府瓷器及相關問題探討〉，圖2。

傳世品中的特別作品：帶官窯款的克拉克瓷器

在已發表的資料中，日本神戶市立博物館所藏的「大明萬曆年製」款水禽紋克拉克盤是一件非常特殊的作品。（圖 18～20）¹⁵ 這件瓷器青花發色鮮豔，盤心菱形開光內繪禽鳥、蘆雁、山水、花卉，盤沿十個圓形開光，裡面交替繪畫雜寶、花卉。器物最為特別的是底部青花雙圈「大明萬曆年制」款，為典型的萬曆官窯款。如果用國立故宮博物院故瓷編號（清宮舊藏）的萬曆官窯瓷器的年款

（圖 21）進行對比，可以看到風格非常接近。之前日本學者也注意到這件瓷器的底款，認為銘文書體和官窯相同，但判斷這件器物為民窯製品。¹⁶

那麼，是否可以認為這件瓷器是官窯作品？從器物本身來看，這件瓷器圈足粘砂，底部有不少縮釉點，並有跳刀痕，這是萬曆民窯通行的製作工藝，達不到官窯瓷器的品質。值得關注的是，2004 年景德鎮御窯廠珠山南麓明中後期窯爐發掘時，曾出土一批克拉克瓷殘片，品種主要為盤類，¹⁷ 代表性器物



圖 18 「大明萬曆年製」款青花水禽紋大盤 正面 © 日本神戶市立博物館藏



圖 19 「大明萬曆年製」款青花水禽紋大盤 底部 © 日本神戶市立博物館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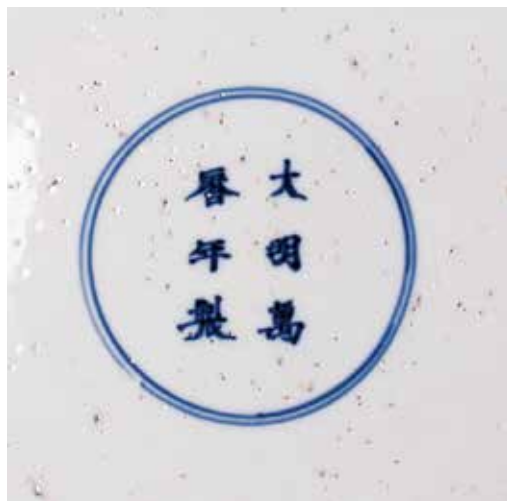


圖 20 「大明萬曆年製」款青花水禽紋大盤 底款 © 日本神戶市立博物館藏



圖 21 明 萬曆 青花仕女四藝碗 底款 故瓷3953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有〈青花開光花卉紋盤〉（圖 22、23），器型與北京故宮出土的一致。以往的觀點會把這批產品的性質看成是民窯，認為這是萬曆後期官窯停燒之後，民窯在御窯廠原址進行燒造的，或是民窯的窯業垃圾在此傾倒堆積所致。但聯繫到北京故宮南大庫的考古出土，以及這件帶萬曆官窯款的克拉克瓷器，不禁讓我們重新思考御窯廠出土克拉克瓷的性質，是否有官窯生產的可能性？

但若只是民窯，為什麼這件克拉克瓷器上會寫官窯款？是因為萬曆時期景德鎮官窯

瓷器實行「官搭民燒」，官民窯業之間存在流通，因而有民窯工匠看到官窯寫款而刻意模仿？目前尚無證據來破解這一特殊現象。

如果說神戶市立博物館這件萬曆官窯款的克拉克瓷器，仍尚難斷定是否為官窯之作，那麼另一件收藏於新加坡的「大清康熙年制」款克拉克瓷器（圖 24、25），基本可以斷定為康熙官窯。這件青花花鳥紋盤為私人收藏，其形制屬 Maura Rinaldi 對克拉克瓷分類中的 VII 式盤，非常典型的克拉克瓷器。盤內心八瓣菱形開光中繪花鳥山石，盤壁一圈為八個



圖 22 青花開光花卉紋盤 景德鎮御窯廠出土 景德鎮陶瓷考古研究所藏 取自江建新，〈景德鎮考古發現的克拉克瓷〉，頁41，圖4。



圖 23 青花開光花卉紋盤 底部 景德鎮御窯廠出土 景德鎮陶瓷考古研究所藏 取自江建新，〈景德鎮考古發現的克拉克瓷〉，頁41，圖4。



圖 24 康熙 青花花鳥紋開光盤 Tiepolo(David Mun), Singapore藏 取自Rinaldi, Maura. *Kraak Porcelain- A Moment in the History of Trade*. London: Bamboo Publishing Ltd, 1989, 232, PL294.



圖 25 康熙 青花花鳥紋開光盤 底部 「大清康熙年制」款 Tiepolo(David Mun), Singapore藏 取自Rinaldi, Maura. *Kraak Porcelain- A Moment in the History of Trade*, 232, PL294.



圖 26 | 明 萬曆青花鳥紋開光盤 「萬曆號」沉船出水 取自Sjostrand, Sten. & Sharipah Lok Lok Syed Idrus. *The Wanli Shipwreck and its Ceramics Cargo*, 200, Serial No. 2334.

大開光依次間隔小開光，大開光內繪雜寶、花卉。盤內壁的紋飾，幾乎是萬曆時期此類克拉克瓷盤（圖 26）的翻版。器物外壁紋飾，與之前的克拉克瓷器不同，為三個纏枝西番蓮紋。圈足為康熙時期典型的二層臺，裡面青花雙圈「大清康熙年制」官窯款。這應該是康熙官窯對克拉克瓷器的仿製，非常獨特。筆者將在下面的結語部分，結合本文中的其他材料，對這件器物再做進一步討論。

國內消費市場的新思考

通過對國內墓葬和遺址出土資料、傳世的特別作品的梳理分析，我們可以明確得出結論，克拉克瓷器這類主要作為外銷的產品，從明代萬曆到清代康熙年間，在中國國內是有流通和消費的。雖然從數量來看，這類產品在國內的消費遠遠不及國外，但應該還是有一定的數量。目前我們收集到的國內留存的克拉克瓷器，還僅是正式考古發現的部分，民間散落的其實還有一定數量。早在 1992 年

中國古陶瓷研究會景德鎮年會上，北京胡雁溪先生在提交的論文〈介紹幾件紋飾別致的明末清初外銷瓷盤〉中就提到：「廣昌出土的十餘件外銷瓷盤發表以來，克拉克的內銷問題已引起海內外學者的關注，僅筆者所見，近二年江西出土這類青花瓷盤就有數百件之多，可見廣昌出土的青花瓷絕非偶然。」他本人當年就從民間收集了不少克拉克瓷，發表在其編著的圖錄《明代民窯青花瓷大觀》中，裡面典型的克拉克瓷盤達 32 件，其中大部分是品相完好、沒有缺陷的。¹⁸

從國內市場的消費對象來看，這類瓷器的使用者既有平民、文人，¹⁹ 也有布政使這樣的地方高級官員，還有藩王，甚至用於宮廷。從使用功能來考察，這類器物既有日用，又用於喪葬，在墓葬中作為壽盤、墓誌而隨葬，也被當作祭器。（圖 27）

值得關注的是，從出土遺址性質看，目前所知出土克拉克瓷器的遺址，等級均較高，為官署（布政使司署）、藩王府、後金都城、明清紫禁城，而且瓷器品質較高，顯示這類瓷器被國內上層階層所接受。當然，我們不清楚明

末清初的這些使用者如何來看待這類新品種，也沒有證據表明當時人們是否會把這類具有多層次開光裝飾的瓷器作為一個特殊類型。

在這些消費現象中，最值得關注的是紫禁城出土和清宮舊藏的克拉克瓷，以及帶官窯款的特殊作品。究竟清宮是如何獲得這類器物的？前文已提到有學者認為清代宮廷可能從前朝接收這些克拉克瓷。若明代宮廷已使用這些瓷器，那聯想到神戶市立博物館的萬曆官窯款盤，這件瓷器是否可能真的是為明廷燒制的官窯作品？也就是說，克拉克瓷器中是否有官窯作品？我們目前還沒有證據來確認，但這些蛛絲馬跡又不得不讓人去猜想。另外，除了從前朝接收這一可能的途徑外，如果我們注意到努爾哈赤建立的第一個都城——赫圖阿拉城有出土克拉克瓷，而且和北京故宮南大庫出土的器型相近，那麼清宮中的克拉克瓷器很可能有另外一條流入的途徑——清宮中最早的克拉克瓷，為後金政權從關外直接帶入。正因為在建立後金政權初期，滿清即已使用克拉克瓷，所以才會在康熙年間讓景德鎮御窯廠仿製，燒造「大清康熙年制」款的官窯作品。赫圖阿拉城的克拉克瓷，後金政權又是如何獲得？當然最大的可能性是通過商品流通的方式獲得。不過，已有學者指出赫圖阿拉城遺址出土的晚明瓷器中，有「大明萬曆年制」款青花海馬繚絡紋缸等御窯瓷器，並認為這些御窯瓷器應該是賞賜品。因為在後金政權建立之前，努爾哈赤和明朝一直保持傳統的藩屬關係，通過通貢受封而能獲得朝廷的賞賜。²⁰ 那麼，同出的克拉克瓷是否有可能也是明朝賞賜的禮物？晉王府、益王府等藩府都使用克拉克瓷器，似乎顯示出這類瓷器的價值較高，因此存在作為贈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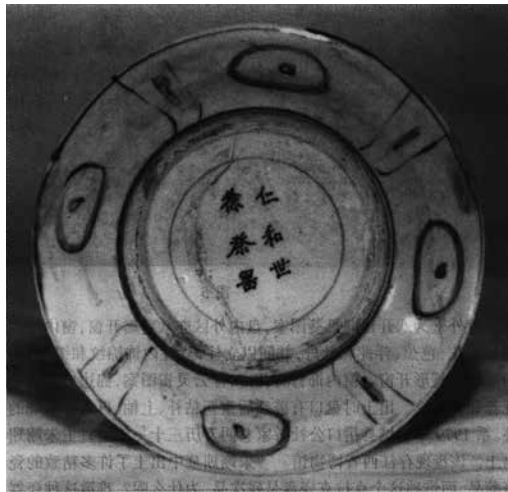


圖 27 青花鹿紋開光瓷盤 私人收藏 取自陳立立，〈克拉克瓷盤與葬俗〉，《民俗研究》，2004 年 4 期，頁 98，圖 6。

的可能性。若這個推測無誤，那克拉克瓷在國內的使用又多一個功用——作為賞賜的禮物。

筆者曾就此題，先後在 Food, Medicine, Material Culture: Methods and Sources for the Study of History 工作坊（復旦大學中華文明國際研究中心，2017年6月23日）和「明

清中國與世界藝術」國際研討會（中央美術學院，2019年11月2、3日）發表學術報告，本文系在此基礎上完成。本研究為上海市浦江人才計劃「歐洲藏明末清初轉變期瓷器的整理與研究」成果。

作者為復旦大學文物與博物館學系教授

註釋

1. 薛翹、劉勁峰，〈江西出土的明萬曆外銷青花瓷盤〉，《江西歷史文物》，1985年1期，頁93-98；江西省文物工作隊，〈江西南城明益宣王朱翊鉞夫婦合葬墓〉，《文物》，1982年2期，頁16-24。
2. 吳志紅，〈明外銷青花瓷盤介紹〉，《江西歷史文物》，1986年2期，頁126-127；姚澄清、孫敬民、姚連紅，〈試談廣昌紀年墓出土的青花瓷盤〉，《江西文物》，1990年2期，頁86-89；孫敬民，〈江西廣昌發現明代崇禎紀年墓〉，《江西文物》，1990年4期，頁69-70+52；江西廣昌縣博物館，〈明代布政使吳念虛夫婦合葬墓清理簡報〉，《文物》，1993年2期，頁77-82；姚澄清、姚連紅，〈江西明萬曆外銷瓷盤的發現〉，《南方文物》，1996年4期，頁83-84；姚澄清、姚連紅，〈江西研究克拉克瓷的新進展——三談江西紀年墓出土的「芙蓉手」〉，《景德鎮陶瓷》，1999年9卷3期（總84、85期），頁62-67；馮先銘、馮小琦，〈荷蘭東印度公司與中國明清瓷器〉，《江西文物》，1990年2期，頁101-104+117；Baoping Li（李寶平），〈逐波泛海——十六至十七世紀中國陶瓷外銷與物質文明擴散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Discoveries and Interpretation of Ming dynasty export porcelain from tombs in China*）〉（香港：香港城市大學中國文化中心，2012），頁205-215。
3. 北京大學考古文博學院、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景德鎮市陶瓷考古研究所，〈江西景德鎮觀音閣明代窯址發掘簡報〉，《文物》，2009年12期，頁39-58；北京大學考古文博學院、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景德鎮市陶瓷考古研究所，〈江西景德鎮明清御窯遺址發掘簡報〉，《文物》，2007年5期，頁4-47。
4. 筆者曾在〈克拉克瓷器新論——以出土新資料為中心〉，《典藏古美術》，314期（2018.11），頁92-101中簡單論及內銷市場。北京故宮博物院項坤鵬副研究員在〈關於故宮南大庫的思考——歷史意涵、建置及克拉克瓷相關問題探討〉，《南方文物》，2018年2期，頁231-236一文中，也關注到這類瓷器在國內的流布和消費情況。
5. Baoping Li（李寶平），〈逐波泛海——十六至十七世紀中國陶瓷外銷與物質文明擴散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江西省博物館編，彭明瀚著，〈明代景德鎮民窯紀年青花瓷〉（北京：文物出版社，2018）。
6. 梁振品、楊榮昌、沈永寶，〈新賓赫圖阿拉城內建築遺址發掘簡報〉，《遼寧考古文集》（瀋陽：遼寧民族出版社，2003），頁142-152。《發掘簡報》中提到出土遺物中有〈荷塘花鳥折腹大盆〉（註：應為大盤）、〈雙鹿踏青鬧春盤〉，並發表了圖片。謝明良教授最先敏銳地發現了這個資料，並在〈澎湖發現的十七世紀日本肥前青花瓷〉（原載《故宮文物月刊》303期，收入謝明良，《陶瓷手記》（臺北：石頭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08），頁258-259）一文中指出這是克拉克瓷，介紹了這一發現。王霞女士對赫圖阿拉城址出土明代瓷器進行了詳細介紹，並進行深入探討，參自王霞，〈關於赫圖阿拉城址出土明代瓷器的思考〉，《南方文物》，2011年2期，頁145-148。
7. 梁振品，〈赫圖阿拉城「尊號台」遺址建築格局及相關問題討論〉，《故宮博物院院刊》，2002年5期，頁54；梁振品、楊榮昌、沈永寶，〈新賓赫圖阿拉城內建築遺址發掘簡報〉，頁151-152。
8. 故宮博物院考古研究所，〈故宮南大庫瓷片埋藏坑發掘簡報〉，《故宮博物院院刊》，2016年4期，頁22。北京故宮博物院在「明清御窯瓷器——故宮博物院與景德鎮陶瓷考古新成果展」（2016年）中展出了兩塊克拉克瓷片。
9. 項坤鵬、趙瑾，〈關於故宮南大庫的思考——歷史意涵、建置及克拉克瓷相關問題探討〉，《南方文物》，2018年2期，頁233。
10. 北京故宮博物院王光堯研究員曾告知，故宮的清宮舊藏中有好幾件克拉克瓷，並且有出版。這一信息促使筆者在北京故宮出版圖錄中找到圖片資料。特此致謝！故宮博物院編，《故宮陶瓷館》下冊（北京：紫禁城出版社，2008），頁350，圖273。
11. 項坤鵬、趙瑾，〈關於故宮南大庫的思考——歷史意涵、建置及克拉克瓷相關問題探討〉，頁233。
12. 筆者2008年夏在廣州市考古所對南越王宮遺址出土明清瓷器的考察中，發現有克拉克瓷。當時尚未意識到該遺址還是明清廣東承宣布政使司署所在地。2017年夏在南越王宮博物館考察時，在臨展廳看到出土克拉克瓷盤和明清廣東承宣布政使司署的說明。因此，明清廣東承宣布政使司署遺址出土的克拉克瓷，肯定不止展出的這一件。
13. 曹俊，〈太原食品街出土明代晉府瓷器及相關問題探討〉，《考古與文物》，2019年4期，頁121、125。
14. 曹俊，〈太原食品街出土明代晉府瓷器及相關問題探討〉，頁121、125。
15. 感謝大阪市立東洋陶瓷美術館學藝課長代理小林仁先生和神戶市立博物館中山創太先生的幫助，本人有機會於2017年對實物進行了調查。
16. 西田宏子、出川哲朗，《明末清初的民窯》（東京：平凡社，1997），彩圖15器物解說。
17. 江建新，〈景德鎮考古發現的克拉克瓷〉，收入鄭培凱主編，《陶瓷下西洋——早期中葡貿易中的外銷瓷》（香港：香港城市大學中國文化中心，2010），頁37-38。
18. 轉引自姚澄清、姚連紅，〈江西研究克拉克瓷的新進展——三談江西紀年墓出土的「芙蓉手」〉。這些瓷器收入胡雁溪，《明代民窯青花瓷大觀》（北京：團結出版社，1993），頁66。
19. 江西廣昌出土有克拉克瓷盤的明代崇禎四年墓，墓主唐可敬即為明萬曆乙卯科舉人，贈五品儒林郎。參見孫敬民，〈江西廣昌發現明代崇禎紀年墓〉，頁69-70。
20. 王霞，〈關於赫圖阿拉城址出土明代瓷器的思考〉，頁146-147。